

# 乡绅人格及其生存常态的突破性建构

## ——论陶少鸿长篇新著《百年不孤》

林稚晖

(香港浸会大学 历史系, 香港 999077)

[摘要]《百年不孤》超越了乡土文学以倡扬或反思革命文化和阶级斗争为宗旨的乡绅形象塑造,采取融合革命历史与挖掘生活内涵的叙事路径,展开乡土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在整体把握乡绅群体命运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和呈现乡土人文结构和生活意境。作品将乡绅置于家族、乡族和国族共同构成的时代环节和历史细节中,探索和重塑其多面性,进而揭示乡绅的价值持守和历史命运。小说以人性的视角发掘主要人物在历史变迁中的思想转变和道德持守,有效地将作品意涵拓展到人格探索和人性建构的层面;同时,小说深入挖掘生活细节,展示乡村日常情态,从而获得建构审美意蕴的深度和探索生活境界的广度。

[关键词]《百年不孤》;乡绅;人性建构;生活境界;审美意蕴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8)01-0025-05

### A Ground-Breaking Construction of the Values and Everyday Life of the Country Gentlemen: On Tao Shaohong's New Novel *One Hundred Years of Insolitude*

LIN Zhihui

(Department of History,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 Kong 999077, China)

**Abstrac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untry gentlemen's image, the novel *One Hundred Years of Insolitude* carves a new path that differs from the ones that focus on praising or reflecting on the revolutionary culture and class struggle. It places this group at the nexus of the family, the country and the nation to explore the multifacetedness, core values and fate of this special group of people. In delving the main characters' insistence of morality in the vicissitude of history, the novel detailedly demonstrates the country gentlemen's personality and nobility. Meanwhile, it also fully illustrates the everyday life in the country, and therefore achieves the depth in aesthetic connotation and the width in explorations on the realm of life.

**Key words:** *One Hundred Years of Insolitude*; country gentlemen; construction of humanity; realm of life; aesthetic connotation

中国现当代的乡土题材文学作品一向把作品的政治意涵和观念立场置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并以阶级立场、阶层分野和革命斗争作为叙述重心和逻辑基点。乡绅是中国近代历史与文学中的特殊存

在,其依托宗族的绅权在传统社会一直作为一种非正式权力,具有与依托国家的正式权力——皇权相互平衡、相互牵制的作用。按照学者徐祖澜的说法,这个阶层占据着知识、财富和身份三大核心因

收稿日期:2017-09-25

作者简介:林稚晖(1987-),女,广东江门人,香港浸会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性别史及中国现当代文学。

素,其中知识是乡绅的表层显性要素,财富是深层次要素和物质基础,身份则是根本性要素<sup>[1]</sup>。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变革,阻隔了乡绅与皇权之间的直接纽带,地方权力的失衡使垄断地方资源的乡绅权力出现短暂的“无序扩展”<sup>[2]</sup>。及至封建帝制被推翻之后,绅士阶层的形象从“四民之首”演变为“无绅不劣”,乡绅作为封建主义的残留象征,成为国民革命乃至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的主要革命对象。然而,正是这种看似分明的阶级属性和清晰的历史命运,掩盖了乡绅群体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可发掘性,使其形象被脸谱化和固定化。

少鸿的新作《百年不孤》打破了这一审美惯性,作者以乡绅为表现主体,旨在历史与人性相融合的审美视野中,塑造一个现代中国的乡绅形象,以此反映中国乡绅命运。那么,与当代乡土文学中的乡绅相比,《百年不孤》呈现的乡绅形象有何特色,作品采取何种路径重现乡绅的历史命运、构筑作品的审美意涵、发掘乡土文化的内在机理呢,笔者拟将《百年不孤》置于中国当代乡土小说对乡绅题材的审美表现中,探索其创作视角与审美意涵,以期获得阐释乡绅题材和乡土文学内涵构建的新思路。

### 一 乡绅题材的文学呈现

作为一个备受争议的历史性存在,“乡绅”成为现当代文学中最能体现时代特征的人物群体,对这个群体的不同塑造方式,既宣示文艺创作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共构关系,又反映作家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对传统文化的省思。不同文学流派对“乡绅”的特征和角色有迥然不同的建构。五四启蒙作家将乡绅塑造成残暴的土皇帝和封建宗法制的维护者,以此达到批判作为“绅权的意识形态基础”<sup>[3]</sup>的儒家伦理这一主要目标,鲁迅《孔乙己》中的丁举人、《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等人物,便是这类乡绅形象的代表。以“描写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和地主阶级崩溃”<sup>[4]</sup>为原则的左翼革命文学,则片面地把乡绅塑造为自私的地主和土豪劣绅,竭力表现乡绅的顽劣和贪婪,这类文学塑造以《倪焕之》中的蒋士镛、《地泉》中的王大兴、《清明时节》中的罗二爷等乡绅角色为代表。这类作品中时有因作家对乡绅文化缺乏认识,而出现“自我消解的尴尬局面”<sup>[5]106</sup>。及至以“阶级斗争”为表现重点的十七年文学时期,作家在强调反面人物“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的‘一半对一

半’”<sup>[6]</sup>,以及强调作家“应该深刻地来描写那些反面的、敌对的人物形象,引起人民对于他们的仇恨和警惕”<sup>[7]</sup>等文艺政策的引导下,着重表现乡绅与农民完全对立的阶级属性,脸谱化地将之塑造为“劳动人民的复仇对象”<sup>[8]</sup>,代表形象包括《李家庄的变迁》中的李如珍、《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钱文贵、《红旗谱》的冯兰池等。而新时期小说以“新乡绅”的概念来形塑改革开放以来乡村体制下的民间权威,概念本身即反映新旧乡绅在社会角色和权力运作上的相似性,旨在表现在经济改革中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时代特点和历史继承性,这类新乡绅的代表形象包括《羊的门》中“一半是人一半是神”的呼天成、《古船》里的赵炳,以及《苍生》中蜕变成“土皇帝”的乡绅邱志国。纵观这些批判性作品,乡绅被定型为应该被打倒的对象,作者往往忽略乡绅的思想和生活细节,对其人性和人格建构缺乏深入描写。除了批判性的形象塑造,20世纪以来的文学作品也曾出现两次正面描写乡绅的潮流,体现了作家对彻底否定和全面摧毁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回应。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的民族文化反思思潮中,自由主义作家笔下的乡绅代表着乡土中国的文化精英,展示了“乡土中国的文化本质——‘人和’思想在民族传统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历史作用”<sup>[5]107</sup>。《江南风景》里的伍老先生、《边城》中的顺顺以及《生死路》中的柳二爷等人物,都代表这类传统儒绅形象。这些形象不仅体现乡绅阶层的道义传统和伦理责任,也折射出自由主义作家在面对传统乡土文化日渐崩溃时的怀恋与伤感。而1985年前后出现的寻根文学,亦在反思“文革”创伤的语境下,通过突出和肯定乡绅的积极意义,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合理性,《白鹿原》中气质超然的思想者朱先生和入世儒绅白嘉轩即为代表。

由此可见,不论作家顺应文艺政策抑或反思传统文化,对于乡绅的文学表现都承载和反映着文学乃至政治意识形态的变迁,乡绅的文学形塑也因此具备了超越文艺审美的价值,成为审思传统文化、把握民族历史脉络以及理解乡土中国想象的关键路径。面对驳杂的乡绅形塑,我们可以发现,站在什么立场来认识这个群体、怎样从宏观历史与微观个体的双重层面理解乡绅的复杂面相,成为解读乡土中国的关键问题。

在此文学背景下,少鸿的《百年不孤》显示出独特的学术探讨价值。作者选取一种融合革命历史

与挖掘生活内涵的叙事路径,来展开以岑国仁为中心的乡土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力求在整体把握乡绅群体命运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和呈现乡土人文结构和生活意境。作品既超越以阶级对立和政治立场为重点的意识形态叙事模式,也融合作者自身家族经验,将乡绅置于家族、乡族和国族共同构成的时代环节和历史细节中,探索和重塑其多面性,进而揭示乡绅的价值持守和历史命运。小说一方面以人性的视角发掘主要人物在历史变迁中的思想转变和道德持守,另一方面深入挖掘生活细节、展示乡村日常情态,从而获得倡扬美好价值的深度和建构生活境界的广度。

## 二 人性发掘的视角与人文关系的探索

《百年不孤》的历史跨度从民国延伸到新世纪之初,以岑氏家族三代为重心,呈现乡绅在近百年历史中的人生和命运变迁。作者着重表现乡绅群体的正面品格,以此呈现这个被扭曲群体的“德”与“善”。这一价值定位和创作目标表明,作者的理性关注点,在于突出乡绅的道德原则和正面形象。然而,在人物精神塑造、性格刻画方面,《百年不孤》并没有以直接讴歌的方式呈现人物正面品格,而是展开了一部人物思想成长史,从而深入地发掘人情人性以及乡土人文关系。

首先,《百年不孤》把政治性活动转化为生活内容来表现,从而使描写重心自然地转向人物的人格品质、性格特征和思维逻辑,这样既拓展了作品的生活和人性展示空间,也呈现了更具人情美的乡土人文关系,使作品区别于其他主旋律式的乡土题材小说,获得更为深广的审美意蕴。

作品关于乡绅如何定位自我身份这一问题的表现,便是一个显例。《百年不孤》突出展示乡村知识分子的农民身份与乡土归属,从而撑破了以阶级对立为表现重点的文艺表现惯性和美学价值逻辑。小说细致展开了岑国仁努力融入农民生活的过程,他不但没有以知识分子或精英阶层来标示个人优越感,而且运用文化优势来实践德善观念,其生活细节和思想演变,体现出乡绅一直寻找和坚守其与普通乡民在日常生活和价值逻辑中的共同基点。

《百年不孤》将乡绅阶层的命运置于波澜起伏的历史和政治环境中进行考察,必然需要呈现在意识形态变革中乡绅与农民两个阶级的对立,但从整体上看,在更根本的层面上,作品突出的是农民与

乡绅之间的和谐与融洽。小说既重点描写了乡绅办育婴堂、开义仓、接济农民等义举,又屡次描写农民请乡绅做中人、建议岑家出售土地以避免批斗、在批斗中也对岑家乡绅手下留情等细节。这些情节设置有效地完成了作品的双重文学传达:在乡绅形象塑造上,作品既直接表现乡绅的“德”与“善”,又通过乡民的信赖和尊重,进一步突出乡绅以德服人的精神形象。农民对乡绅的同情、尊重乃至爱护,使针对乡绅阶级的斗争呈现出以人情和人性为基点的乡土斗争形态。而在作品内蕴传达的层面,这种克服矛盾对立的和谐状态,以及以人情为基础来淡化和消解矛盾的处理方式,恰恰呈现出乡村社会的人情美。作品并不纠缠于乡绅阶级与农民阶级的政治立场,而是转而充分发掘乡绅及乡民在人性价值和行为抉择上的内在情理,从人性人情的视角拓展了对乡绅和乡土历史变迁的审美理解。正是这种巧妙融合意识形态与乡村人文普适价值的创作思维,使《百年不孤》对乡土人文关系的把握更为细致真实,从而具备更为深远的审美境界和文化意义。

其次,在人物精神境界的定位和判断层面,《百年不孤》没有固化乡绅的精神世界,或者静态化地赋予人物崇高而稳定的思想境界,而是通过细致刻画其个性性情和日常生活体验,动态地展示人物的原则和价值变化过程。换言之,作品叙述了乡绅的精神成长史。

主要人物岑国仁的精神成长过程便是一个典型。这一过程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是乡村生活经验的积累与为人处世的成熟。岑国仁从不知道怎么当农民,到放牛砍柴、逐步适应乡村生活,从第一次做木材生意被压价的笨拙和迷茫,到不自觉间能提出“存钱还不如存实物”<sup>[19]236</sup>的生意策略,作品细致展示了他在日常生活历练中的成长过程。在此过程中,作者屡次触及了乡绅身份和阶层差异等问题,细致地呈现乡绅的自我身份界定的转变过程。其二是道德观念的自觉与精神境界的持守。岑国仁为清乡运动书写文书而产生近乎杀人的愧疚,故而逃官。这与其说是他的善良使然,不如说体现的是他偏软的个性与朦胧的是非观。随后一段迷茫而无措的乡土生活描写,更加显示出他的个性弱点。而当他经历了办育婴堂、开义仓赈灾民、为龙舟赛做中劝架等一系列历练之后,当初朦胧的善意才逐渐转变为自觉的德善意识。他在困难时期原

谅并救助曾经失手害死母亲的廖光忠,多次为乡亲舒厄解困,体现出对“德”与“善”原则的持守。如此一来,《百年不孤》不仅呈现乡绅美好的人格特性和道德原则,而且动态地展示乡绅人格和品德的形成过程,从而使人物个性与精神品格具有更丰满多元的审美魅力。

再者,在人物形象塑造层面,《百年不孤》屡次描写由于家庭意识而产生的“落后”政治观念和因个性特点而导致的人物性格缺失,这与作者塑造乡绅正面形象的人物定位存在反差。岑励奋和岑国仁两代乡绅对革命的理解及其缺乏革命热情的表现,就是突出的例证。作品多次揭示两代乡绅“家庭重于革命”的思维逻辑。例如母亲埋怨儿子岑国义、岑国安参加战争而几乎错过父亲寿辰;岑国仁在东北沦陷的背景下,仍反对儿子唱戏支援抗战;岑国仁对有志于共产主义革命的三弟岑国安,直言“我不关心那些主义之争,我只在意家人的安危”<sup>[9]208</sup>。这些都体现出两代乡绅以家庭为重心的思维逻辑。此外,岑国仁出资助杨霖解困并带其躲避追捕,是出于爱慕之情,而非理解或追随其革命理想。笔者认为,作者刻意弱化人物政治思想境界,而注重展示其家庭观念和个人情感的人物塑造,正是《百年不孤》有别于其他乡绅题材小说之处。这些思维逻辑和具体行为,恰恰体现了一个乡绅家族的宗族伦理和乡土本色。作者通过突出情感因素在人物现实抉择和价值判断中的重要性,塑造了更真实而生动的乡绅形象。

另一方面,作品也不刻意避开正面人物的行为过失和性格缺点。作品的前半段屡次描写岑国仁在面对爱情、自身前途以及时局变化时的怯懦和迷茫,不断提及他在婚后依然对少年心仪对象保持着秘而不宣的留恋与关注,并描写了他与堂嫂林小梅的情感纠葛和出轨行为。岑国仁重遇廖光忠欲报杀母之仇、举起岩块而不敢砸下的细节,虽然展现了他厚德宽恕的品格,但也体现出他个性上的软弱。小说的其他人物同样是正面品格和个性瑕疵兼而有之。作者既表现共产党员杨霖对革命事业的执着追求,也描写她对岑国仁的感情利用。而作为生于乡绅家庭但长于革命环境的代表,岑佩琪对革命理想坚定不移,但这种坚定在举报家人时却显得冷酷无情且有违孝道。这些正负因素兼有的人物形象表明,作者放弃了“光环式”的人物构建,而选取了人性探讨的路径,更加真实地表现了各个人

物性格的层次性和人生抉择的复杂性,这为作品平添了更为丰富的人生意味。

### 三 日常机理的呈现与“生活境界”的建构

《百年不孤》不仅从人性人情的角度对乡绅形象进行重新塑造,其日常生活话语建构也进一步拓展了作品的意义构建基础。作品虽然以宏观的革命历史事件为关注点和情节推进线索,但在具体的叙事中,作者却将宏观历史内涵放置在次要地位,转而关注乡村生活的日常性,并细致入微地描述生活样态。于是,作品在叙事框架层面,显示的是国族、乡族和亲族三个维度下乡绅的历史命运;而在乡土生活的文学呈现层面,则以人文关怀的视野呈现了充满人情味的生活情态。作品在乡绅历史命运书写的框架中,打破了意识形态化的叙事结构,以细致丰满的生活细节和日常情态,构建了关于乡绅生命历程的生活境界。

在乡土变革的审美呈现层面,《百年不孤》对日常生活的内在机理进行了深入的体察,将时代变革和历史走向融入了真实可感的乡村生活中。

如果按照主题集中的创作原则来衡量,《百年不孤》的作品节奏和情节开展不免有些“松散”,甚至因为干扰叙事节奏而弱化了作品的内涵传达。作者充分展开乡土生活的描写,使作品包含了大量与“乡绅历史命运”这一叙事主线逻辑联系并不紧密的情节,以及看似不必存在的人物,比如国英失忆和日本兵闯入这样的情节。但这些看起来弱化波澜的艺术处理,恰恰是乡村生活情态的真实反映,使作品完成了百年历史变化与人物日常生活的交织结合。例如,通过国英失忆后重返岑家的描写,暗示文夕大火的影响;通过岑佩瑶上学读书和当教师的描写,反映了女性社会角色和自我期待的变迁;而抗日战争这样重大的历史背景,则是通过岑国仁在双龙镇看到飞机以及几个日本兵偶然经过扰乱龙船比赛的情节来体现。这些情节表明了作者的生活立场,真实地反映了一个小乡村在历史变迁中的位置。双龙镇既不是历史事件的中心,也不可能处在战争、革命和现代化的洪流之外。作者构筑了乡村的生活情态与多元人性,展示了乡土社会自为自在的完整性,进而把这个微小的社会单位编织入国家巨变和民族历史的大环境,探索乡土社会以及当中的人在历史中的处境。此外,作品也不断呈现双龙镇的乡村生活形态与人生景观。为岑

励畚祝寿、黄唯臻制作擂茶等情节,体现了日常生活的温暖和人情味;岑国仁养牛放牛、做木材生意、村民举行龙舟赛等细节,则细腻可感地揭示了乡村生活的基本形态与特性,丰盈了文本的历史现场感。

在文化元素选择层面,《百年不孤》充分发掘各种乡土传统文化元素来进行审美构建,既展现了乡村民俗的丰富性和文化意涵,又使文本超越政治文化局限,具备历史叙事框架之外的田野价值和审美境界。

作者善于在情节的推进中自然地融入乡土文化元素,以写实性的艺术手法,表现出对乡土文化和乡村民众的关注,成功构建了《百年不孤》的民俗特色和地域特色,深化了作品的生活实感与生活境界。开秧门、合长生等乡村习俗,以及花面狸、倒路鬼这些具有民间传说色彩的环节,都体现了朴实而灵动的民间生态话语和乡土社会文化特点,使作品具备了更为广阔的审美艺术空间和精神境界。此外,岑国英出嫁时的哭嫁风俗、国英失忆之后的喊魂情节,也生动地展示了湖南乡村的风俗习惯及民众的生活景观。这些文化元素既体现了作者对民间生态和精神气息的深入了解与纯熟掌握,也有力地拓展了文学作品对乡土文化的挖掘与审美呈现。

不过,作品在情节和人物关系的把握上也有未充分展开之处,例如,作品前半段用了一定篇幅铺垫的土匪马氏族谱和岑国安被毒害事件,在后半段却未充分地解释和跟进有关情节。另外,作品对乡土社会权力结构变化的发掘也不够深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作品思想力度的欠缺。

总体而言,《百年不孤》超越了乡土文学以倡扬或反思革命文化和阶级斗争为宗旨的乡绅形象塑造模式,有效地将作品意涵拓展到人格探索和人性建构的层面,并始终保持着弘扬崇高品格的精神内涵;同时,作品成功构筑了乡土生活的审美深度,呈现了深广的人文精神和生活境界。

#### 参考文献:

- [1] 徐祖澜. 历史变迁语境下的乡绅概念之界定[J]. 湖北社会科学, 2016(6): 107.
- [2] 王先明. 乡绅权势消退的历史轨迹: 20世纪前期的制度变迁、革命话语与乡绅权力[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1): 97.
- [3] 金观涛, 刘青峰. 开放中的变迁: 再论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M].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3: 216.
- [4]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决议[J]. 文学导报, 1931, 1(8): 1.
- [5] 晏洁. 论中国现代文学多重视角下的“乡绅”叙事[J]. 文学评论, 2014(1).
- [6] 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 新华书店, 1949: 23.
- [7] 茅盾. 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 在中国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 人民文学, 1953(11): 24.
- [8] 兰建蓉. 二十世纪以来乡土小说中的乡绅形象论[J]. 剑南文学, 2012(1): 93.
- [9] 少鸿. 百年不孤[M].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

责任编辑: 黄声波